

“苏湖熟,天下足”等谚语与南宋浙西低田水稻种植

沈世培 鲍 琴

(安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要】南宋时期太湖地区产生了“苏湖熟,天下足”等谚语,史料证明浙西低田稻作种植是谚语产生的主要支撑。历史上太湖流域以种植一季晚熟的粳稻为主。南宋时期,随着经济重心南移,浙西低田全面开发,农业经济特别是低田水稻生产发展显著,水稻品种增多,以水稻为主的作物种植制度趋于多样化,水稻产量提高。南宋浙西低田水稻种植的进步,促进了浙西经济繁荣,提高了浙西经济地位,催生了谚语。

【关键词】谚语;南宋;水稻品种;水稻产量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21)02-0015-12

On Proverbs like "A Good Harvest in Suzhou and Huzhou, a Life of Abundance for All the Country" and Low-field Rice Cultivation in Western Zhejiang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EN Shi-pei Bao Qin

(School of History,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2)

Abstrac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proverbs like "a good harvest in Suzhou and Huzhou, a life of abundance for all the country" came into being in Taihu Lake region. Historical literature reveals that those proverbs were created on the basis of low-field rice cultivation in western Zhejiang. Historically, cultivation in Taihu Lake region had mainly relied on one season of late japonica rice. But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economic center shifted southward. Hence the low-field cultivation in western Zhejiang came into full swing and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low-field rice in particular, witnessed marked advance, with an increased number of rice grains, diversified systems of rice-centered crop cultivation and greater rice yield. It is the progress in low-field rice cultivation in western Zhejiang during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sulting in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elevated status of western Zhejiang, that gives birth to afore-mentioned proverbs.

Key words: proverbs;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ice variety; the output of rice

南宋时期,太湖地区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①、“苏常熟,天下足”^②等谚语。南宋时期,经济重心转

[收稿日期] 2020-06-20

[作者简介] 沈世培(1964—),男,历史学博士,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思想史和近现代史;鲍琴(1979—),女,安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中国近现代史。

① [宋]薛季宣:《浪语集》卷28《策问二十道》;[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宋]范成大:《吴郡志》卷50《杂志》;[宋]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宋]徐元杰:《梅野集》卷2《月日进讲》;[宋]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2《函韩首》等。

② [宋]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

移到江南,最能反映这一变化的是这些谚语的产生。从谚语材料看,谚语所涉及的苏州、湖州、常州,属于太湖地区的南宋浙西^①。为什么南宋浙西地区会出现这些“谚语”呢?南宋之所以产生了谚语,主要原因是太湖地区低田全面开发及其农业经济繁荣,而农业经济繁荣主要体现在稻作种植变化。学界对宋代特别是南宋太湖流域农业发展情况多有研究,涉及土地开垦及农业发展等研究^②。这对理解“谚语”产生具有重要作用。但是,学界对谚语产生缺乏专门研究,目前学界对谚语产生的研究有三点不足:第一,缺乏从谚语材料内容来研究谚语产生的原因。谚语材料出自不同文献,记述的内容也不同,梳理这些材料,可以弄清谚语产生的原因。第二,只是在论述宋元时太湖流域农业发展或稻作种植时提及谚语。如有观点认为,“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流行于宋元时代,“苏湖(常)”,代表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③。这种看法比较笼统,有点大而化之。笼统地认为两宋太湖流域农业经济发展是谚语产生的原因,而没有从南宋浙西低田水稻生产考察,是难以弄清南宋“谚语”产生的真正原因的。第三,也有观点认为谚语与低田水稻生产关系密切,但是没有专门论述。如认为宋元明清时期太湖、鄱阳湖和洞庭湖等平原和湖沼地区外供粮食,产生了“苏湖熟,天下足”“苏常熟,天下足”及“湖广熟,天下足”等谚语,而圩田(围田或垸田)在苏湖、湖广等地水稻生产中扮演主要角色^④。只有深入研究南宋浙西低田稻作种植,才能弄清谚语产生的原因。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谚语产生的原因,本文从谚语材料内容考察出发,弄清南宋浙西低田稻作种植与谚语的关系,包括稻作品种增多、种植制度多样化、产量高等方面。

一、谚语材料证明浙西低田稻作种植是其产生的主要支撑

谚语产生于南宋时期,但是记载谚语的文献,有南宋时期的,也有元明时期的。从谚语材料内容可以看出,谚语产生与浙西低田稻作种植关系密切。

(一)“浙西之水田”即低田是谚语产生的主要地区

南宋薛季宣《浪语集》卷28《策问》载,“‘苏湖熟,天下足’,则又发于田家之谚”。谚语反映了浙西苏州、湖州、常州等地区农业的繁荣。元代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载,“晋宋以降,仓廩所积,悉仰给于浙西之水田。故曰:‘苏湖熟,天下足。’”也就是说,“浙西之水田”产生了谚语。“浙西之水田”主要是从浙西“泽国”转化而来。元代任仁发《水利集》卷5《水利问答》载,浙西处于太湖地区,环太湖地区,总体呈湖盆状态,“浙西地形最为低洼”。又如明代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2《任都水水利议答》及明代沈岱《吴江水考增辑》卷3《水议考上》均载,“浙西之地,低于天下,而苏、湖又低于浙西”。位于太湖周围的苏、湖、常、秀诸州,“环湖地低,故常多水”^⑤。特别是苏州一带地势低平,号为“泽国”。“浙西之水田”就是由这些环湖低地改造过来的。因为“浙西之水田”地势较低,在文献中,常把“浙西之水田”称为“低田”。如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说,太湖地区,“水田多而高田少”^⑥,这里把低田称为“水

①《宋史》卷88《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2173页)载,宋室南渡后,两浙路分为浙东路和浙西路,浙东路包括绍兴、庆元、瑞安3府,婺、台、衢、处4州;浙西路包括临安(杭州)、平江(古吴郡,隋置苏州)、镇江、嘉兴4府,安吉(湖州)、常州、严州3州,江阴1军,相当于今浙江新安江以北,江苏长江以南及茅山以东地区。

②如虞云国:《略论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宋元明部分》第3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等。

③张家炎:《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

④曾雄生:《中国历史上的黄穆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⑤[清]金友理:《太湖备考》卷3《水议》,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4页。

⑥[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4页。

田”。太湖地区低田,起源于春秋末期,经过唐、五代开发,形成塘浦圩田;北宋后期虽然注意修筑,但是成效不大。对江南耕地进行全面彻底垦辟是在宋室南渡以后。南宋时期,宋室偏安江南,统治中心主要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农田水利政策必然以江南为重,浙西低田全面兴修,形成各种形式低田。从史料看,谚语反映了浙西低田的重要性。谚语所说浙西的苏州、湖州、常州,都属于太湖流域,在南宋时水田都得到充分开垦,而水田充分开垦主要体现在低田开垦。在浙西的苏州、湖州、常州、秀州四州中,以苏州最为重要,低田最多,谚语尤其突出了苏州水田的重要性。浙西水田之美,成就了浙西在全国的经济重心地位。在史书中,对浙西水田赞美之词尤多,如《宋史》中多次提到江南水田的好处,认为南宋加大了对浙西水利田兴修,使浙西成为全国水利田最多的地区。太湖地区农田有高田和低田,处于太湖地区的江南平原多为“低田地帶”,这些低田为太湖地区农田的主体部分,历史上太湖地区2600多万亩农田中,平原洼地占68%^①。这些低田生产繁荣产生了谚语。如宋代叶绍翁《四朝闻见录》卷2《函韩首》载,“浙西十四郡耳,‘苏湖熟,天下足’,元帅之所知也,而况生齿日繁,增垦者众,苇萧岁辟,圩围浸广,虽不熟,亦足以支数年矣”。明代归有光《三吴水利录》卷3《周文英书一篇》载,浙西水田水利条件较好,粮食收获最多,“苏湖常秀四路,田土高下不等,田之得粮十分为率,低田七分,高田三分,故谓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浙右”。随着太湖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和手工业发展,粮食生产地位降低,明代粮食产区的重点区域转移到湖广地区,南宋“苏湖熟,天下足”或“苏常熟,天下足”等谚语,到明清逐渐被“湖广熟,天下足”谚语所取代。总的来说,长江中下游平原和溪泽地是宋、元、明、清时期粮食主要产地和供应地,而其中低田在水稻生产中扮演主要角色。

(二)谚语是浙西产米甲于天下的反映

元代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载,“浙西产米之地,甲于天下……京师、郡县官吏军民,家家食用江南老米,则‘苏湖熟,天下足’之言,信不诬矣”。该材料表明,南宋谚语产生于浙西低田区,并主要由稻米生产支撑。浙西稻米收获量大,是天下粮仓。宋代徐元杰《梅野集》卷2《月日进讲》载,“外郡合一道所收,不如浙一州之稔。谚言‘苏湖熟,天下足’”。浙西水稻收获量大,是谚语产生的重要原因。江南水乡,特别是太湖流域,有大量水田,水利条件好,有利于水稻生产,浙西产米甲于天下,产量高,收获量大,天下受益,不仅可以满足本地民众的粮食需求,还可以供给外地。从其他材料也可以得到佐证,如元代任仁发《水利集》卷2《水利问答》载,北宋时期,太湖地区粮食生产发展显著,范仲淹说:“苏之一郡,自可岁收数百万石,足为国家粮储,况浙西七郡之广,其为利又不可胜言矣。”明代张内蕴《三吴水考》卷8《范仲淹上宰臣书》载,范仲淹又说:“苏、常、湖、秀,膏腴千里,国之仓庾也。”到南宋时,淮南由于战火的摧残而荒废,经济重心完全移到江南地区,浙西尤其重要。明代姚文灏《浙西水利书》卷2《任都水水利议答》及明代张内蕴《三吴水考》卷8《任仁发水利问答》称,“亡宋南渡,全藉苏、湖、常、秀数郡所产,以为国计”。南宋卫泾《后乐集》卷13《论围田札子》载,“承平之时,京师漕粟,多出东南,江浙居其大半。中兴以来,浙西遂为畿甸,尤所仰给,岁获丰穰,霑及旁路”。太湖地区粮食运销到浙东的宁绍平原、温台沿海平原及福建、淮南等地,甚至运销到金国。

可见,谚语材料表明,南宋浙西低田稻米生产的繁荣,超越了历史时期。南宋浙西农业生产进步,主要还是体现在低田稻米生产的发展,这是谚语产生的主要原因。

二、稻作品种增多

北宋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9《上吕相公并呈中丞谥目》说,历史上,“东南之田,所植惟稻”。“江南、两浙、荆湖、广南、福建土多粳稻”^②。在引种占城稻前,江苏、浙江、安徽、江西一带普遍种植一季粳

① 汪家伦:《历史上太湖地区的洪涝问题及治理方略》,《江苏水利》1984年第4期。

② 《宋史》卷174《食货上二·农田》,中华书局,1977年,第4204页。

稻。《全唐诗》卷218杜甫《后出塞五首》说,唐代,大量稻米北运,“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太湖流域一般种植晚熟的粳稻,“吴地宜粳稻,玉粒香甜,为天下甲,其种名不一”^①。王正己《废湖辨》说,“东南粳稻以水为命,陂泽所以浸灌,无陂泽,是无粳稻”^②。南宋范成大《劳畝耕·并序》也记述了苏州粳稻种植,“何曾识粳稻,扪腹尝果然”^③。粳稻对水利条件要求很高,适宜低田生长。中国水稻有粳稻、籼稻和糯稻等,粳稻是低田主要粮食作物。低田主要种植粳稻,并种植其他作物,由此产生了谚语。

随着稻作品种演化,到南宋时期浙西主产水稻品种很多,粳稻、籼稻、糯稻都有很多品种。常熟县物产丰富,水稻品种很多。南宋《琴川志》卷9《叙产》载,常熟县稻类:粳稻有稬稬、闪西风、红莲、箭子稻、香粳米、鼠郎黄、野稻、鹌鹑斑、雪里寻、雪里拣、师姑粳、稻公拣、顾公拣、白稻、瞬哥稻、稻里拣、雪里扮、拣出稻、九节稻、无名稻、麦争场;糯稻有赶陈糯、矮糯、抄社糯、师姑糯、秋风糯、青杆糯、金钗糯、铁梗糯;先稻(籼稻)有节澳稻、金成、先禾、乌口稻、赤谷稻等,“已上名色甚多,姑举其概耳”^④。昆山县水稻品种就很多,早稻有红莲稻、再熟稻、香稻、乌野稻、雪里拣、白野稻、闪西风、赶麦长、软秆青、时裹白、六十日稻、百日稻、半夏稻、金城稻,常种之稻有乌口稻、舜耕稻、乌粒稻、睦州红、稬稬稻、彷徨稻、山乌稻、瓣白稻、稻里拣、红蒙子、下马看,糯稻有赶陈糯、杜交糯、乌丝糯、妇女糯、金州糯、定陈糯、宣州糯、佛手糯、师姑糯^⑤。其他类似记载不少。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么多稻种中,就包括了占城稻,如常熟县稻作中,金钗糯、金成等属于占城稻;昆山县早稻中,六十日稻、百日稻、金城稻等,就属于占城稻。浙西低田以苏州(平江府)最多,常熟县和昆山县属于苏州,田地主要为低田。端平二年(1235),常熟县所管田地,处于浙西低地,有水田和旱地,水田是旱地的16.3倍,低田比例最大^⑥。又如苏州昆山县,官租名色90%叫“朝籍围田”^⑦,田地多为低田。文献记载的占城稻不可能完全种于高田,也应该种于低田。这就引出了一个学术问题,低田能否种植占城稻?

宋代稻作种植制度的一大变化是占城稻的引种。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一说四年)从福建引进了早熟又耐旱的占城稻,“布之江、淮、浙之间”^⑧。关于占城稻,学界已有研究,涉及占城稻引种对双季稻、三熟制的影响,对江淮以南早籼或早稻栽培的影响,对籼稻广泛栽培的影响等问题^⑨。

清代鄂尔泰《授时通考》卷20《谷种》载,占城稻,一名畚稻,“高仰处皆宜种之,谓之旱占,其米粒大而且甘,为早稻,种甚佳,北方水源颇少,陆地沾湿处,宜种此稻”。这一定义,似乎占城稻只是在高田种的“旱稻”,不能种于低田。宋代高田增加,旱干地需要耐旱的作物品种,耐旱的占城稻正好适应了这一

① [宋]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元]庐镇续修:《琴川志》卷9《叙产》,《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6页。

② [宋]胡矩修,方万里、罗浚纂:《宝庆四明志》卷12《鄞县志》,《宋元方志丛刊》第5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5150页。

③ [宋]范成大:《劳畝耕·并序》,《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④ [宋]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元]庐镇续修:《琴川志》卷9《叙产》,《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6-1237页。

⑤ [宋]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下《土产》,《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1-1082页。

⑥ 沈世培:《南宋江南圩田经济地位试探》,《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⑦ [宋]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中《税赋志·官租篇》,清黄氏士礼居钞本。

⑧ [宋]赵不悔修,罗愿纂:《新安志》卷2《叙物产》,《宋元方志丛刊》第8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7615-7616页。

⑨ 参见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徐晓望:《〈占城稻质疑〉补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第3期;陈志一:《关于占城稻》,《中国农史》1984年第3期;曾雄生:《宋代江西水稻品种的变化》,《中国农史》1989年第3期;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严火其、陈超、夏如兵、殷小霞:《宋代占城稻的引进与气候变化》,《中国农史》2013年第5期;黄桂:《关于占城稻若干问题探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等等。

需要,这是宋代引进占城稻的根本原因^①。《陈旉农书》卷上《地势之宜篇第二》载,“高田旱稻,自种至收,不过五六月,其间旱干,不过灌溉四五次,此可力致”。似乎江、淮、浙推广占城稻是在高田旱荒之地。所以,学界一般认为,占城稻,“是一种能够种植在高昂地段上耐旱的稻禾,适应性强,而且早熟”^②,即占城稻种在高田。浙西低田多,似乎不适合占城稻的种植。曾雄生先生认为,从福建引种的占城稻,推广到江、淮、浙三路,其中江西种植面积大,江浙种植面积小,而浙西小于浙东^③。也就是说,浙西很少种植占城稻。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南宋两浙路嘉泰《会稽志》、嘉定《赤城志》、宝庆《四明志》、咸淳《临安志》等四部方志均提到占城稻之名,其中有三部属于浙东。不过,不能因此得出浙西很少种植占城稻的结论。占城稻在引种过程中,各地出现了不同名称。如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载,浙东会稽一带稻作品种很多,有56种之多,其中蚤占城、白婢暴、红婢暴、八十日、黄岩、硬秆白、软秆白、寒占城、红占城、紫珠糯、赤壳糯、金钗糯等都是占城稻。宋代赵与泌《(宝祐)仙溪志》卷1《物产》载,占城稻,“其种甚多,难以俱载”。如占城稻在江淮推广,“到了南宋初年,江淮稻田所种的水稻品种,十之七八为占城稻”^④。游修龄先生总结一些方志及文献中占城稻异名有20个之多,如占禾、占成、百日黄、蚤占城、金城、六十日、白婢暴、红婢暴、八十日、泰州红、硬秆、软秆白、百日赤、金钗糯、占早、六十日粳、八十里粳、百日粳、尖头黄粳、畚稻等,还不是全部^⑤。占城稻在各地异名很正常,就像山芋在各地也有不同名称,达几十个之多。范成大《劳畚耜·并序》,也记述了苏州栽培的“来自海南”的“占城稻”,“或自占城传”^⑥。如明代黄省曾《稻品》载,常州小稻之种,有六十日粳、八十里粳、百日粳之品,而皆自占城。清代鄂尔泰《授时通考》卷20《谷种》,对占城稻引进增加稻作品种的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宋太宗诏江南之民种诸谷,真宗取占城稻种散诸民间,“昔之粳稻,惟秋一收,今又有旱禾焉,二帝之功利及民远矣”。就是说,在粳稻之外,又增加了占城稻这一“旱禾”品种。

那么,如何理解占城稻在浙西低田的种植呢?

太湖地区有“高田”,种植占城稻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占主体部分的低田能否种植占城稻呢?关于这一问题,学界讨论不够,只是认为低田很少种植,浙西由于水利发达,土壤肥沃,对耐旱、耐瘠和早熟的品种需求很小,种植占城稻面积不大,仍以粳稻为主^⑦。这一观点,可能不完全正确。因为浙西低田有三种不同状态,每一种情况对占城稻的需求是不同的。

第一种状态是水灾年景。呈湖盆状态的环太湖地区,上有洪水过境,下有江海潮流倒灌,常有水患,“苏之田膏腴而地下,尝苦水患”^⑧。水灾年景,粳稻不能种,占城稻也不能种植。此时,传统的黄籼稻可以作为补种稻作^⑨。

第二种状态是旱灾年景。在旱灾年景,占城稻自然可以在浙西低田广泛种植。清代鄂尔泰《授时通考》卷20《谷种》载,北宋时,因两浙旱荒,命于福建取占城稻,“初止散于两浙”。这地方不能理解占城稻只能种于高田,除了种于“高田”外,也必然可以种于干旱的低田。到南宋时期,浙西低田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成不变,并不是水利条件一直都较好,有时会遇到水旱灾害。特别是“豪门巨室并缘为奸,加倍围

① 严火其、陈超、夏如兵、殷小霞:《宋代占城稻的引进与气候变化》,《中国农史》2013年第5期。

②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5页。

③ 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苏士珩、陆荣、金远举主编:《巢湖文化全书》(五)《农耕文化卷》,安徽省皖中印务有限责任公司,2011年,第53页。

⑤ 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⑥ 范成大:《劳畚耜·并序》,《范成大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

⑦ 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⑧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1页。

⑨ 曾雄生:《中国历史上的黄籼稻》,《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裹,又影射包占水荡,有妨农民灌溉”^①,”江、浙水利,久不讲修,势家围田,堙塞流水”^②,浙西低田水利遭到破坏,失去蓄水和泄水功能,水旱灾害不断。正如黄震《黄氏日钞》卷84《代平江府回裕斋马相公催泄水书》所载,低田,“稍觉旱干,则占据上流,独擅灌溉之利,民田坐视,无从取水”,造成下游低田干旱。浙西低田这种生态和水利失调,从高宗时就开始了。虽然孝宗和宁宗时期对失序的低田进行挖掘,但是效果有限,并不能禁止势家围裹。到宁宗以后,由于南宋后期韩侂胄北伐、抵抗金人和蒙古人等斗争,军费负担沉重,为了增加财赋,又放任势家围裹,进一步破坏了低田水利和生态。从北宋到清末,每隔7.9年有1次旱灾^③。这些干旱低田,不能种植粳稻,而耐旱的占城稻就是重要的稻作。

第三种状态是正常年景。在正常年景,由于南宋有低田治理技术、水车排灌、曲辕犁起垄,该储水时储水,该排水时排水,浙西低田与其他水田没有区别,是可以种植占城稻的。我们不能误认为低田一直浸在水中,把低田特殊化。如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五《宁国府劝农文》载,“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一般水稻“苗既茂矣,大暑之时,决去其水,使日曝之,固其根,名曰靠田”。占城稻也是如此。在正常年景,有两点可以证明低田可以种植占城稻:第一,从习性来说,占城稻耐旱,名为“旱稻”,实为水稻。占城稻是一种抗旱力强、成熟期短、适应性很强的水稻品种。耐旱、早熟、不择地而生等是占城稻突出的优点^④。说它耐旱,并不是说它一定要种于旱地或高田。它是一种水稻,只是耐旱而已。史载,“(占城)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⑤。该史料没有说占城稻一定要种于旱地或高田,而是“不择地而生”。一般认为占城稻只能种于高田,实际上它还是一种适应性很强的稻种,在高田和低田都适应种植。明代黄省曾《稻品》载,占城稻,“寔耐水旱”。第二,浙西低田经过整理,可以保证水源,也可以排水,为占城稻栽培创造了条件。北宋时,因为“江淮、两浙稍旱即水田不登”,占城稻引进后,“分给三路为种,择民田高仰者蒔之,盖旱稻也”^⑥。这给人的感觉好像占城稻只能种于高田,实则不然。据元代胡古愚《树艺篇》卷3《谷部》载,占城稻栽培方法,“其法:南方地暖,二月中旬至三月上旬,用竹笼周以稻秆,置稻种其中约五斗许,又覆以秆,入池浸三日,伺微热如甲拆状,则出而布于地。及苗与谷等别用真竹器贮之,于耕过田细土,停水二寸许布之,三日决去水,至五日伺苗长二寸许,复引水浸一日,乃插蒔”。也就是说,占城稻是一种在水田种植的水稻,能排能灌的浙西低田也可以种植占城稻。讲占城稻是“旱稻”,耐旱,不能因为一个“旱”字,就说占城稻只能种于旱地或高田。所以,在正常年景,浙西低田是可以种植占城稻的。不过,粳稻高产,仍然是主要作物,在这种情况下,占城稻种植是少的,不会是主产作物。占城稻的引种,改变了原来晚粳独尊的局面,出现了粳稻与占稻的并存^⑦。

宋代引进的占城稻,不仅能种于高田,还可以在低田种植。原有稻作品种演化和占城稻引进,使浙西低田稻作品种增多,使低田能够被充分利用,不至于荒闲,可以增加水稻收获量,对该语产生是有意义的。

三、浙西低田以水稻为主的作物种植制度多样化

宋代尤其是南宋,是农业种植制度变革的重要时期。浙西低田以种植粳稻为主,也种植其他作物,以水稻为主的作物搭茬种植,使农业种植制度多样化。谚语材料显示,谚语是太湖地区综合性农业发展

①《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农田》,中华书局,1977年,第4189页。

②《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农田》,第4185页。

③汪家伦:《历史时期太湖地区水旱情况初步分析(4—19世纪)》,见华南农学院:《农史研究》第3辑,农业出版社,1983年。

④严火其、陈超、夏如兵、殷小霞:《宋代占城稻的引进与气候变化》,《中国农史》2013年第5期。

⑤《宋史》卷173《食货上一·农田》,中华书局,1977年,第4162页。

⑥同上。

⑦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的结果。南宋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载,谚语反映了苏州一带百姓勤奋,“吴中厥壤沃,厥田腴,稻一岁再熟,蚕一年八育……吴中之民,开荒垦注,种粳稻,又种菜、麦、麻、豆,耕无废圩,刈无遗陇……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这一谚语内容,主要讲苏州一带开垦低田,种粳稻、养蚕是主要经济活动,并“稻一岁再熟”,稻稻连作,“又种菜、麦、麻、豆”,搭茬种植,耕作制度发生了变化,复种指数增加,种植多样化和随意性,增加了浙西低田产量,农业经济繁荣,催生了谚语。

(一)水稻种植期和成熟期不同

江南一般种植粳稻,在这些稻作品种中,粳稻是主要品种,粳稻中有早、中、晚之分。北宋沈括《梦溪笔谈》卷26《药议》就载,“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者,有十月熟者谓之晚稻”。清代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载,“粳乃谷稻之总名也,有早、中、晚三收”,“粳稻六七月收者为早粳,八九月收者为迟粳,十月收者为晚粳”。南宋时,粳稻分早、晚较多。如常熟县,除了乌口稻“再蒔晚熟”外,在粳稻中,糯稻“熟最早”,闪西风“八月熟”,红莲“有早晚二种”,箭子稻“晚熟”,香糯米“晚熟”、野稻“早晚二种”,雪里寻“晚熟”,师姑粳“晚熟”,稻公拣“早晚二种”,白稻“早晚二种”,麦争场“六月熟”^①。

籼稻,也分早、晚。如常熟县,籼稻又称为“先稻”,节澳稻“早熟”,金成“早晚二色”,先禾“为早熟之稻”^②。其中,占城稻是一种早稻,被引进后,江南水田多了一种耐旱的籼稻,并演化出很多品种。其种植遍及浙、闽及淮南一带。占城稻引进对浙西低田双季稻种植的意义,还在于占城稻引进增加了早稻品种。清代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载,在早稻中,有粳稻,有籼稻,其中六十日稻、百日稻等为籼稻,都是占城稻。临安有早熟的“早占稻”^③。清代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载,“早稻,即占城稻,二三月插蒔,至六月熟”;早占稻,“籼似粳而粒小,始自闽人得种于占城国,其熟最早,六七月可收品”。也就是说,早占稻六七月熟,比粳稻七月早熟、八九月中熟、十月晚熟还早些,所以说“其熟最早”。如南宋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7《草部》载,浙东会稽一带占城稻,有早占城、中占城、晚占城和寒占城4类。当时,江南有了不同的早晚稻,在常州,“今夏熟者曰早禾,冬熟者晚禾。品色不一,难以枚数”^④,早晚稻品种比较多。游修龄先生指出,文献记载占城稻,有早熟、中熟、晚熟多种^⑤。

糯稻,也分早、晚。如常熟县糯稻有,矮糯“晚熟”,抄社糯“未交社先熟”,师姑糯“晚熟”,秋风糯“早熟”,青杆糯“晚熟”^⑥。

(二)多样化农业种植制度

水稻及其他作物种植期和成熟期不同,有利于水稻连作及搭茬种植。我国农业原为一年一熟制,到中唐以后,北方出现了二年三熟制,江南出现了一年二熟制。宋代二熟制有稻稻连作、稻麦连作、麦豆连作等形式,多出现在两浙、江南东路、福建沿海平原、成都平原等地区^⑦。南宋浙西低田农业种植制度多样化,以水稻种植为主,体现在水稻连作及作物之间搭茬种植。

第一,双季稻种植。南宋嘉定(1208—1224年)进士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所载,“吴中”,“稻一岁再熟”,也是谚语产生的因素之一。不过,学界对宋代双季稻栽培估计不高。对于双季稻,

① [宋]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元]庐镇续修:《琴川志》卷9《叙产》,《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6—1237页。

② 同上。

③ [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58《风土》,《宋元方志丛刊》第4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3870页。

④ [宋]史能之纂修:《咸淳毗陵志》卷13《土产》,《宋元方志丛刊》第3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3059页。

⑤ 游修龄:《占城稻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1期。

⑥ [宋]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元]庐镇续修:《琴川志》卷9《叙产》,《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6—1237页。

⑦ 葛金芳,顾蓉:《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及其估算方法辨析》,《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包括对宋代早稻和晚稻、双季稻的研究^①,曾雄生先生认为,宋代的晚稻可能是真正的晚稻,而早稻却不是真正的早稻,宋代所谓的“早稻”和“晚稻”实际都属于晚稻,只不过是晚稻中的早熟或晚熟品种而已。宋代文献中早稻和晚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双季稻的发展。早、晚稻之间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构成复种关系^②。占城稻引进前后,太湖地区水稻品种以一季晚粳为主,直到近代才提出了农业改制的问题,即晚稻改早稻,单季改双季^③。在宋代水稻的主产区浙西地区,“早稻仍然没有取代晚稻的地位,在水稻生产中仍然是以单季晚稻为主,并且一直保留到了近代”^④。李伯重先生也认为,江南平原大部分地区直到明代后期还实行水稻一年一作制^⑤。虽然如此,南宋浙西低田双季稻栽培是值得注意的。南宋浙西低田双季稻有再生稻和连作稻,水稻连作制有了发展。

再生稻。宋以前太湖流域双季稻主要是再生稻,再生稻是水稻收获后,其茎基部萌芽抽穗结实的稻。如西晋左思《吴都赋》载“国税再熟之稻”,说明西晋时期吴都即苏州一带已有再生稻。宋代再生稻遍及两浙、江淮,甚至于荆湖等地区。南宋时期,浙西低田区再生稻普遍存在。吴郡主要是低田区,范成大《吴郡志》载,苏州有“再熟稻,一岁两熟”^⑥,就是再生稻,又叫再撩稻。如昆山县再熟稻,“田家遇丰岁,苗根复蒸长,旋复成实,可掠取,俗谓再撩稻”^⑦。在太湖流域,再生稻现象普遍。另外,占城稻引进后,也成为再生稻品种。国外学者认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标志之一,就是占城稻的种植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年二熟制的普及^⑧。曾雄生先生认为,占城稻虽然在扩大耕地面积方面,特别是梯田的开发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对于多熟制的影响不大,认为太湖地区多是晚稻和麦类的轮作,占城稻对于稻田多熟制的影响不大。他又认为,再生双季稻多是在原来一季晚稻的基础上,由于雨水调适,重新抽茎结实,不需要特别的品种,与占城稻的关系不大^⑨。笔者认为,占城稻引进后,对浙西低田双季稻种植是有积极意义的。问题是晚稻收割在深秋,天气已经转冷,再生稻生长就很困难了。如果是早稻,再生稻生长就有可能。再生稻在太湖流域普遍存在,只有早稻收获后,才有可能长出再熟稻。占城稻为早稻,收割后是否可以长出再熟稻呢?我们从史料看,占城稻是早稻,具备了再生稻的条件。元代胡古愚《树艺篇》卷3《谷部》载,“早稻,即占城稻……至八月熟,刈后若频得雨,往往再生,谓再熟稻是也”。清代李彦章《江南催耕课稻编》载,占城稻,“其已刈而根复发苗再实者,谓之再熟稻,亦谓之再撩,其在湖州一穗而三百余粒者,谓之三穗子”。虽然占城稻的引进对稻田多熟制影响不大,但是早占稻的存在,对双季稻的发展还是有意义的。

连作稻。双季稻连作是指早稻收割后,再插晚稻。不仅南宋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说“吴中”“稻一岁再熟”,而且南宋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也载,南宋“吴地海陵之仓,天下莫及,税稻再熟”。说明浙西低田实行了双季稻栽培。曾雄生先生认为,连作稻在宋代不仅存在,而且分布广泛,认为乌口稻最初见于南宋,南宋《淳祐玉峰志》记载昆山一带种植“其谷色黑,稻米最晚者”^⑩。乌口稻,南宋

① 如游修龄:《宋代的水稻生产》,《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66-267页;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等。

② 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③ 曾雄生:《试论占城稻对中国古代稻作之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1991年第1期。

④ 曾雄生:《宋代的早稻和晚稻》,《中国农史》2002年第1期。

⑤ 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

⑥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30《土物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38页。

⑦ [宋]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下《土产》,《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1页。

⑧ [宋]大泽正昭:《唐宋变革期农业社会史研究》,汲古书院,1996年,第236-249页。

⑨ 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⑩ [宋]项公泽修、凌万顷、边实纂:《淳祐玉峰志》卷下《土产》,《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082页。

宝祐年间《重修琴川志》也记载常熟有乌口稻“再蒔晚熟”^①，而且还有连作稻。宋至明清，江浙水灾多发地区一直保有这一品种^②。明代黄省曾《稻品》载，“其再蒔而晚熟者，谓之乌口稻，在松江色黑而耐水与寒，又谓之冷水结，是为稻之下品”。晚熟的乌口稻，可以作为水灾后补种的一季晚稻，或早稻收获后“再蒔”的连作晚稻。昆山、常熟低田很多，就常熟而言，从五代至两宋，常熟大修低田，农业生产条件好，自唐以来就是江南重要的水稻产区。乌口稻是重要作物，说明浙西低田有了双季稻种植。虽然乌口稻作为双季稻种植的面积可能不大，但是水灾后救荒是有作用的。

第二，作物之间搭茬种植。宋代特别是南宋，在江南推广麦、粟、黍、豆、麻等旱作种植，这些作物也有不同的种植期和成熟期。随着这些旱作的种植推广，占城稻的引种，水稻品种增多，不同作物种植期和成熟期都不同，各种作物搭茬种植，江南农业种植制度多样化成为趋势。浙西低田也同样如此。浙西低田，虽然以一季晚粳为主，但是其农业是综合性农业，不仅有双季稻，而且根据需要，水稻与其他作物搭茬种植，或其他作物之间搭茬种植，充分利用土地，不使田地荒闲，体现了作物之间搭茬种植的随宜性。繁多水稻品种，有了早、中、晚水稻品种，就给江南水稻种植提供了机动性，比如七月早熟的粳稻是早稻，而早占稻成熟更早，水稻熟期不同，有利于水稻茬口搭配，包括水稻连作，为双季稻生产提供了可能，而且也有利于水稻与麦豆等作物搭茬连种。多样的种植制度都有利于提高低田产量。如果单纯水稻种植，也带不来浙西经济的繁荣，必须是多种作物种植，多种经济经营，才能带来经济繁荣。

四、低田区水稻产量高

在太湖地区，低田区水稻生产水平最高。谚语反映了浙西经济的繁荣，特别是水稻突出的生产地位。

（一）水稻亩产量高

南宋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载，南宋末期，高斯德说到浙西水稻，“其熟也，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邓广铭、漆侠先生也认为，宋代江南湖泊水渠较多的地区出现了大量圩田，“这使农业产量得到很大的提高，因而出现了‘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谣”^③。

水稻亩产量也是学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有关江南水稻亩产量的记载，宋代以前不多，宋代以后变多了。根据这些记载，学术界对唐宋以来水稻亩产量进行了研究。水稻亩产可以从稻谷和稻米两个方面来看，一般多从亩产稻米量。学界对宋代稻米平均亩产量看法不一，一般定位在1至2石左右^④。这是一个平均数。不过，由于自然、历史和各地农业生产发展水平不同，还要看到各地粮食亩产也有很大差异。那么，南宋浙西低田稻米亩产量是否高于这个平均数呢？学界对太湖流域稻米亩产量估计看法不

① [宋]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元]庐镇续修：《琴川志》卷9《叙产》，《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237页。

② 曾雄生：《宋代的双季稻》，《自然科学史研究》2002年第3期。

③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3页。

④ 如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估计，宋代亩产量一般是2石，最差的也有1石，按宋代1石，折今市石6.6斗，合92.4斤；葛金芳《宋辽夏金经济研析》（武汉出版社，1991年，第135页）认为，宋代全境平均亩产为1.875石，折合今制每亩197.5斤；余也非《中国历代粮食平均亩产量考略》（《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估计，南宋江南稻米亩产量2石；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量研究》（农业出版社，1985年，第160页）认为，亩产2石应是中等水平，不过吴慧《清代粮食亩产的计量问题》，《农业考古》，1988年第1期）又认为，宋代一石合今0.66市石，一亩合今0.9市亩，水稻平均亩产量3.18石，折合现代每亩平均312市斤，其中南方水稻每亩381市斤；斯波义信《宋代的消费、生产水准试探》（载于东京都立大学《中国史学》第1号，1991年）认为，南宋末期和元代为2石；闵宗殿、董恺忱《关于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认为，长江流域水稻平均亩产量1.5石米，按米1市石，折成谷约为200斤，以此折算，宋亩产1.5石约合今亩产谷222斤。

一,有的估计是比较低的,认为浙西稻米亩产量在2石以下^①。这个数据与宋代文献所载估计数字相比偏低了,这低估了南宋时期浙西低田水稻亩产量。这与亩产量计算方法也有一定关系。有学者在估算宋元明清江南地区粮食亩产量时,采用按佃农所纳租额翻倍计算方法,一般佃农缴租,约为收成的一半,亩产量也就相当于租额的二倍。此办法有一定道理,但在某些情况下会低估当地农业生产水平^②。从实际情况来看,南宋浙西低田水稻亩产量是高于这个数字的。

南宋时期,太湖地区水稻产量提高,最主要是体现在浙西低田水稻产量的提高。太湖地区水田尤其是低田水稻产量提高,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南宋浙西与北宋不同,其水稻产量高于北宋,有三点原因:第一,除了水、土、热条件好外,南宋时期北方人口大量迁到江南,尤其太湖地区流民最多,他们带来了北方生产技术,太湖地区人民勤劳,耕作技术高,精耕细作,使这里成为集约化生产的典型地区。宋代吴泳《鹤林集》卷39《隆兴府劝农文》载,浙西人勤于耕稼,“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勤所致也。”宋代高斯得《耻堂存稿》卷5《宁国府劝农文》载,“浙人治田,比蜀中尤精……故谚曰‘苏湖熟,天下足’。虽其田之膏腴,亦由人力之尽也”。第二,南宋加大了浙西低田开发和治理,也为农业生产发展创造了条件。第三,占城稻的引种,稻作品种增加,再生稻和连作双季稻栽培,有利于提高低田年亩产量。游修龄先生认为,宋代粮食单位产量的提高得力于复种指数的增加^③。虽然没有准确数字说明南宋浙西低田水稻产量,但是有些估计数字还是能说明问题的。

从纵向历史来看,南宋时期浙西低田水稻产量高于历史时期。唐宋以来,太湖流域一直是全国水稻的高产区,“它的亩产量应是全国大面积高产记录的代表,而不是全国水稻平均亩产的反映”^④。北宋时期,浙西低田就因这里水利条件好,有高于全国水稻平均产量的记载。苏州之田,北宋范仲淹在给仁宗皇帝上疏中讲到,“中稔之利,每亩得米二石至三石”^⑤,即每亩产米2至3石之间,合稻谷4至6石,超过全国平均值。据南宋岳珂《愧郈录》卷15《祖宗朝田米值》载,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在苏州、湖州一带,“如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合米2石,与范仲淹说法相似。神宗时,水利专家昆山入郑亶在其所著《吴中水利书》中,阐述了他对太湖流域的治水设想,“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出米四石。则十八万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万石矣。今苏州止有三十四五万石,借使全熟,则常失三四十万石之租。又况因水患而蠲除者,岁常不下十余万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余万石,是则遗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无忧,则三四十万之税,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则民间从可知也”^⑥。这就是说,苏州地区如修好水利,可以变沼泽为水田,扩大耕种面积,按每亩产米4石计,18万亩可以产米72万石。每亩产米4石,当然是郑亶对苏州治水之后水稻亩产量的理想估计,“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那怕较每亩4石为低,也应不低于3石”^⑦。

到南宋时期,水稻产量进一步提高。南宋陈傅良《止斋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载,孝宗、光宗之际,陈傅良知桂阳军时说,“闽、浙上田米三石,次等二石”,也就是稻谷上田6石,次等的4石。如宁宗嘉

① 梁庚尧《南宋的农村经济》(第145页)认为,浙西稻米亩产1.2~2石之间;李伯重《宋末至明初江南农民经营方式的变化(十三、十四世纪江南农业变化探讨之三)》(《中国农史》1998年第2期),根据宋代孙应时修的《(宝祐)重修琴川志》卷12《学》所载刘宰撰于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正月十五日常熟县《义役记》,全县50都,共有义役田51310亩,平均每亩租额5斗,据此认为南宋后期江南稻米平均亩产量,应当远低于2石,很可能只是1石多些而已。

② 葛金芳、顾蓉:《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及其估算方法辨析》,《湖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

③ 游修龄:《宋代的水稻生产》,《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第266页。

④ 闵宗殿、董恺忱:《关于中国农业技术史上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

⑤ 《宋会要辑稿》(七)卷4749《食货六三之二一七》(中华书局,1957年,第6093页)载,纳租米,“如愿以稻子,二硕折米一硕”。1硕为1石。

⑥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6页。

⑦ 葛金芳、顾蓉:《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及其估算方法辨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定二年(1209),湖州知州王炎奏称,“本州岛境内,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则一岁增米三十万硕”^①。这种湖边草荡是筑堤围湖而成的“新田”,是一种低田,水利条件好,亩收稻米3石,稻谷则6石,产量较高。南宋浙西低田稻米亩产量是高于历史时期的。据葛金芳先生估算,北宋时期太湖流域水稻亩产量,从11世纪40年代每亩产米2~3石,到12世纪初叶上升到3~3.5石,旱涝保收田则在3.5石到4石之间。“这些记载,有的出自当时人,有的出自当地人,应该比较可信”^②。漆侠先生认为,宋代稻米单位面积产量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以江浙为例,宋仁宗时亩产2、3石,北宋晚年到南宋初已是3、4石,南宋中后期5、6石,是不断增长的^③。他计算的依据是两浙路太湖流域和江东路圩田是宋代稳产高产田集中所在,“亩产量从北宋的米3石发展到南宋时的5~6石或6~7石,高达600~700斤”^④。就太湖流域来说,宋代两浙路,“亩产量高达五、六石或六、七石,约一亩多地即可养活一个人,农业劳动生产率从单位面积产量看比战国提高了三四倍”^⑤。这些产量最高的估计,都是对低田产量的估计,说低田是粮食高产区。从史料来考察,浙西低田水稻亩产量是比较高的。

从横向区域比较来看,南宋浙西低田稻米亩产量,也高于其他地区。南宋江南地区水田多,总体水稻产量高于北方,但是江南各地也并不相同。从区域比较来看,浙西低田都是稻米亩产量最高区域:

第一,就太湖地区高田和低田比较来看,低田产量高于高田产量。如南宋黄震《黄氏日钞》卷84《与叶相公西涧》载,湖、秀等田由于高产,租额也高,元租亩收1石,而高田产地租少,“如常润渐北,则地渐高而土渐饶,所收亩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产量低,租额也低很多。

第二,浙西低田产量高于江东圩田和浙东湖田产量。浙东湖田属于围湖垦田,江东圩田属于低洼溪泽筑圩垦田,与浙西低田一样,都是江南水稻高产区,但是浙西低田最多,规模最大,水稻产量最高。日本学者斯波义信认为,南宋亩产稻米比较高的地区是浙西和浙东,上田约为3石,次田2石。这个估计高于全国平均值。而亩产在3石以上的水田,分布在苏州、嘉兴、绍兴、明州等地的中心区域,而最高的是浙西吴县的学田,达4.52石^⑥。不过,浙东也有地方产量高的,如明州(今宁波)城西广德湖未废的时候,“计七乡之田,不下二千顷”,“七乡民田,每亩收谷六七石”^⑦,折合米3至3.5石,但是区域没有浙西大。江东路有大量水田,圩田也不少。南宋岳珂《愧郈录》卷15《祖宗朝田米值》载,南宋宁宗嘉定年间(1208—1224),平均亩产达到每亩2石米,亩产相对太湖地区稍微低点。

第三,浙西低田稻米亩产量更是高于江南其他非圩(围)区。如《林溪集》卷11载,湖南,“膏腴之田,一亩谷三斛”,合米为1.5石;《洛水集》卷10载,安徽休宁亦为“每亩一石五斗”,稻米产量都比太湖地区低。产米最丰的是两浙地区,而浙西低田水稻亩产量最高,“两浙又以苏、湖、常、秀等州为中心。苏州一带,普通年成每亩平均产米三石,可见江南单位面积产量之高了”^⑧。其中,苏州低田农业收入最为突出,“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无过于苏州”^⑨。

(二)谚语反映浙西是南宋财赋最主要来源地

浙西由于水稻产量高,是宋代特别是南宋财赋倚重地区。陆游《渭南文集》卷20《常州奔牛闸记》载,“方朝廷在故都时,实仰东南财赋,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常熟,天下足’”。宋代薛季宣《浪语

①《宋会要辑稿》(五)卷4750《食货六之三·垦田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第4894页。

② 葛金芳、顾蓉:《宋代江南地区的粮食亩产及其估算方法辨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③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38页。

④ 邓广铭、漆侠:《两宋政治经济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68页。

⑤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页。

⑥ [日]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方键、何忠礼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8页。

⑦《宋会要辑稿》(六)卷17540《食货六一之一〇·水利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第5928页。

⑧ 张家驹:《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页。

⑨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62页。

集》卷28《策问》载,淮、浙经济地位重要,“国用之所仰赖”。南宋财赋收入主要来自江东、两浙。如绍兴二十九年(1159),全国上供米年额468万石,实数367万石,而江东、两浙上供米年额243万石,实数205万石,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而其中两浙路上供米年额150万石,上供米实数120万石,份量最大^①。在这三路中,以二浙为重。两浙路,“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②。高宗时,“二浙每岁秋租,大数不下百五十万斛,苏、湖、明、越其数大半,朝廷经费之源,实本于此”^③。南宋苏籀《双溪集》卷9《务农》载,“今淮南往往为斥候之郊,罕复种植,赋入惟恃二浙而已”。不仅江东、两浙的上供米占全国总数的大部份,而且和籴也以江、浙地区为主。而在二浙中,又以浙西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浙西是当时财政重心。特别南宋和籴,以浙西为多,浙西原为105万石,宁宗嘉定(1208—1224)时期,仅平江府和籴数就有100万石;嘉定以后,“常熟岁籴,多至三十万石,少亦不下十四五万石”^④,为该县苗税7万多担的二至四倍。正是因为浙西低田大量垦辟,作物种植制度变化,产量提高,浙西经济地位也提高了。苏、湖、常、秀四州,环绕太湖,受其哺育,土地肥沃,成为南方最发达的农业区,也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⑤。谚语表明了苏、湖、常地区粮食生产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代表的是长江三角洲地区^⑥。南宋财赋更是主要依赖浙西。在苏州(平江府)低田最多,在浙西最为丰产,“缘平江水田,以低为胜,昔之赋入,多出于低乡”^⑦。可以看出浙西低田财政地位了。

结 语

从谚语史料内容看,谚语产生是有多方面原因,其中南宋浙西低田水稻种植发展是谚语产生的主要支撑。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谚语产生于两宋太湖流域农业的繁荣。北宋之所以谚语还没有形成,很大程度是因为浙西低田开发不够,农业种植制度变革有限。南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浙西低田全面开发,并浙西低田水稻种植制度发生变化:水稻品种不断增多,包括北宋引种的占城稻可以在低田区种植;由于稻作品种增加,加上麦、粟、黍、豆、麻等旱作推广,为水稻连作和作物间搭茬种植创造了条件,种植制度多样化成为趋势,包括双季稻栽培、水稻与其他作物搭茬种植及其他作物之间搭茬种植等;由于占城稻种植,水稻品种增多,双季稻发展,浙人精耕细作,水稻亩产量提高显著,不仅高于历史时期,而且比其他地区高,浙西不仅是南宋的粮仓,也是南宋财赋倚重之地。总之,南宋时期,浙西低田水稻生产地位突出,提高了水稻亩产量,提高了浙西经济地位,使浙西成为南宋经济最为繁荣地区,以致产生了谚语。

(责任编辑:徐定懿)

①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八月条。

② 《宋史》卷88《地理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2177页。

③ 《宋会要辑稿·食货六一之一〇八——一〇九·水利杂录》,中华书局,1957年,第5928页。

④ 《资治通鉴长编》卷512元符二年七月丁未条;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7《进故事》;[宋]孙应时纂修,鲍廉增补,[元]庐镇续修:《琴川志》卷6《叙赋》,《宋元方志丛刊》第2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208页。

⑤ 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8页。

⑥ 张家炎:《明清长江三角洲地区与两湖平原农村经济结构演变探异——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

⑦ [宋]范成大:《吴郡志》卷19《水利下》,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7页。